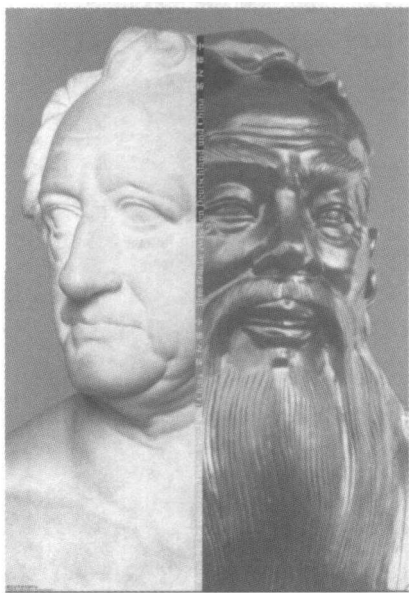


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

□ 杨春时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思潮，但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自由主义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主流，而且难免有一个最终失败的结局。这个历史经验应当认真总结。

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即社会历史条件的不适宜；二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即自身的缺陷。

关于自由主义失败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学界论及较多，主要有缺乏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弱小），以及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内外思潮的左倾化，等等。这些观点都有道理，本文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错位。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实现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即一方面要改革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另一方面要争取民族独立。本来，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切合一致的，在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性的政治基础。但是在中国却不同，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发生了冲突，并导致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现代性是启蒙理性精神，它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它引导社会向现代化前进。现代性发源于西方并且首先在西方获得了胜利，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现代理性精神的始因。“五四”从西方引进现代性，即科学和民主，从而开始了中

国的启蒙运动，它必然是以反传统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要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西方列强，而西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源泉。这意味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必须反对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对立。由于救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更深刻的内涵。五四运动尝试以肯定现代性的方式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路，自由主义曾经唱了主角，全盘西化，反传统成为潮流。但由于当时的形势国难当头，长期启蒙难以立时奏效，故“五四”以后，社会革命骤起，反

帝代替了学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取代了启蒙主义,自由主义被冷落。最后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自由主义分化、瓦解,分别投向敌对阵营。关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问题,笔者已有专文,此不赘述。^[1]

至于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学界较少论及,因此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以便从中找出其特性。中国自由主义是在“五四”时期发生的,在这之前,中国只有政治改良主义,以后又分化为政治保守主义(保皇党)与政治激进主义(革命派),没有形成自由主义思潮。由于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产生了启蒙运动,而这时自由主义才被引进。中国自由主义首先是文化自由主义,《新青年》同人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致力于输入学理,以收长期启蒙之效。只是由于国难当头,五四运动爆发,启蒙主将纷纷走向政治战场,以胡适为首的一部分文化自由主义者也开始以舆论干预政治,从而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后来,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分化到两个阵营中去,政治自由主义失败。而在解放后文化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中,文化自由主义也消失。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走向失败的历史。

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出,它先天不足,具有一些根本性的弱点,正是这些弱点才导致其失败。这些弱点有:

首先,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本土文化思潮,而是外来思潮。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一些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没有基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群鲁迅笔下的“假

洋鬼子”。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自由主义的始因,“五四”自由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一直没有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深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个体本位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本位价值观针锋相对,它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走向历史舞台的。这就注定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援意识,它可以成为启蒙的先锋,但难以成为主流思潮。这与欧洲自由主义不同,欧洲自由主义从古希罗马文化中汲取了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从传统中获得了支援意识,因此成为现代性的主流思潮。对于这个弱点,中国自由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了,他们一方面反传统,主张西化,同时又力图证明中国自古就有自由主义传统,如胡适就说:“在信仰与思想自由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扬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信仰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2]但这种牵强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上述“豪杰之士”虽有反抗,但缺乏个人主义信仰,终究算不上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相比,就更能说明问题。共产主义也是外来思潮,但它经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传统中找到了支援意识,这就是集体主义、民本思想和民族主义,这些传统思想被改造为现代的阶级意识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它是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却始终没有消除与传统文化的对立,没有成为本土文化思潮。因此,共产主义胜利了,自由主义失败了。

中国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弱点就

是其主体——自由主义者几乎都是文化人,而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西方,自由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广大的中产阶级。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队伍里几乎没有实业家、职业政治家,更没有普通市民和工人农民,差不多清一色是文化人,而其核心是一些学者。最活跃者是以胡适为领袖、以《新月》、《现代评论》杂志为中心的一派人。他们虽然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但只限于学术圈子和文化界,人数不多,对社会底层影响不大。他们没有也不想与民众结合,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掌握市民社会(况且中国的市民社会也很弱小),基本上不从事政治活动,不进行社会运动,而只是在公共社会活动,企图通过造舆论来影响上层统治者。这就注定其没有前途和走向失败。共产党人也是以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团体,但他们很快与工农民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革命运动,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自由主义者失败了,共产党人胜利了。

中国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思想的坚定性。中国自由主义者虽然服膺个人主义,但内心深处却难免民族主义情结。而且五四启蒙运动引进自由主义并非为了解放个人,而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从而达到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目的。这样,自由主义只是救国的手段,它必然要服从民族主义。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自由主义阵营就不断有人分化出去,并且在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后,大多数人放弃自由主义立场。自由主义蜕变过程中有三个大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面前,一批自由主义

代表人物如蒋廷黻、钱瑞升、吴景超、丁文江就公开主张效法法西斯，实行新式独裁、新式专制，企图依靠蒋介石挽救民族危亡。以后，这几个自由主义人士就被拉入国民党政府，还有傅斯年、王世杰、吴鼎昌等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政府。胡适等人虽然反对新式独裁的主张，但也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并且在抗日战争中到国民政府做官。第二个环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两党大决战前夕，自由主义阵营向左右两个方向分化，一部分如胡适派和民、青两党投向国民党；另一部分如绝大多数民主党派投向共产党，自由主义阵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土崩瓦解。第三是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和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清除了自由主义信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者仅为凤毛麟角。这场清洗非常彻底，不仅改变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立场，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个人主义、民主观念、科学主义等都被清除。必须指出，这种立场和思想的改变，不仅仅是政治压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自觉自愿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坚守立场呢？根本上说是民族主义情结使然。既然自由主义只是救国的手段，当它不奏效时，就可以放弃。无论是国民党的独裁还是共产党的专政，只要能救国，就可以接受。建国后民主党派负责人自称对共产党由畏服到敬服到心服，应该不是虚言。共产党确实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走向强大的中国，实现了多少代人的梦想，包括自由主义者的梦想，他们怎么能不信服呢？共产主义救了中国，而自由主义却无能为力，坚持自由主义又有多大

意义呢？

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三种形态，自由主义的弱点和失败也体现在这三种自由主义上。

经济自由主义是指主张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思潮，它是经济领域里的自由主义，也是自由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是最贫乏的，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大革命、共产革命各个阶段，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成为重要的思潮。主导中国经济变革的思想一直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国家对经济加以控制、对私人资本加以限制的主张。洋务运动主张发展工商业，但主要是由官办或官督商办，而不是发展私人资本。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也没有提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而是着眼于“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他认为这种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章太炎、朱执信等思想家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惟恐导致“贫富悬隔”、“可致不平之制”。五四运动中产生了文化自由主义，并没有产生经济自由主义；相反，却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节制资本”的“集产的社会主义”，即以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以防止私人资本控制国计民生。他说：“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3]这就是以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蓝本。共产革命则提出社会主义，后来毛泽东又提出新民主主义为作为其过渡阶段，即先限制私人资本而后取消私人资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关心，甚至不赞

成。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考察苏联后,虽然不赞成其独裁政治,但对其经济国有制度却有赞许之意。他说“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解决的方法有两条:“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及运动不断地发生。”^[4]值得重视的是,“五四”期间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杜威、罗素都不赞成在中国搞自由资本主义。《新青年》于1919年9月号开始连载杜威的讲演。杜威在讲演中提出,中国应当吸取工业化国家劳资对立的教训,采取某种经济政策,以防止将来的社会革命。罗素到中国访问、讲演,他认为中国应当参照俄国的共产主义,由国家控制经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5]可见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多大市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文化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但经济自由主义不在其视野之中,并且事实上认同了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和节制资本的政策。最要命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就不敢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他们认同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忍受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在20年代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组织上海总商会,虽然曾经为自己的利益与政府抗争过,但始终不敢反对民生主义和节制资本的政策。他们情愿在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下苟存。至于解放后,经济自由主义就更没有生

存的余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阙如,使中国自由主义失去了根基,变成了文化人的一种空洞的议论。

“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鉴于辛亥革命作为单纯的政治革命,缺乏思想启蒙的准备,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想过早介入政治斗争。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致力于输入学理,改造国民性,为政治变革做准备。但在1919年5月4日以后,政治问题(民族危机和政治腐败)已经无法回避,于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派开始参与政治斗争,《新青年》也变成了政治刊物,后来又筹组共产党。胡适代表的自由派也开始关心政治,介入政治。胡适先是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要从具体社会问题着眼改造社会。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自由主义者与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一起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声称“我们原本是不愿谈实际政治的,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能妨碍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点一滴的血汗换来的……”^[6]此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就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中国政治自由主义诞生了。中国政治自由主义是以胡适为领袖、以一批文化人特别是一些学者为主体的散漫的一群。他们力图在左右两派和国共两党中间保持独立,以自由主义来影响中国政治进程。中国政治自由主义者干预政治的途径主要是影响舆论,因此办刊物就成了他们的几乎是惟一的斗争手段。从《每周评论》到《现代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把工夫下在政治评论上。

他们抨击时政,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胡适对国民党的“训政”的批判是很深刻的;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人在《新月》上进行的反党权、争自由的斗争也是颇为壮烈的。但从总体上看,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其首领胡适是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进行批判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曾经参与过政治斗争,最著名的是胡适、蔡元培等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摧残人权的斗争。但胡适等认为争取民权运动“必须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反对进行政治斗争,而只进行法律斗争。他特别反对同盟提出的“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甚至认为政府有权镇压一切反抗行动,而只是主张“在现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应该受正当的法律保护”,而蔡元培也暗中同情胡适的立场,^[7]这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对实际政治斗争的规避。由于“民权保障同盟”中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歧,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这场运动终止。在抗战中成立了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主体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高潮时期。他们企图形成“第三种势力”,引导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但中国政治自由主义最终走向失败。一方面,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国民党并没有把他们当做“诤友”,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走向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由主义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只好向左右两个方向分化,从而自行瓦解。

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了呢?除了社会历史条件不利于其生存、发展外,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介入只限于公共社会领域，基本上不涉及政治领域。他们不组建政党（抗战时期才有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党，但很快就分化、瓦解），胡适标榜“无偏无党”，甘心做政府的“诤友诤臣”。他们也不准备夺取政权，不搞社会运动，拒绝实际的政治斗争，只是造舆论，搞宣传，因此难收实效。这是没有政治家、没有政治实践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劝谏，推进一点一滴的改良，促使国民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为此，他们采取了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补天”的态度，甚至企图当蒋介石独裁政权的“诤友”。这样，他们的独立性就必然难以保持，最后自由主义的右翼向国民党靠拢就不可避免。总之，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这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进行政治斗争的要求，没有掌握政权的意志，它只图眼前的生存，与国民党政权妥协。20年代的上海总商会曾经要求由它来进行地方自治，后来就被国民党控制，再也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

失去了积极的社会支持，自由主义变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因而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文化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在这个领域，自由主义较好地发挥了作用。文化自由主义继承了“五四”传统，致力于思想启蒙，主张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创造现代社会。它除了进行启蒙宣传外，就是重视教育，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是教授等文化人。“五四”以后，当激进派投向革命（救亡）时，自由主

义坚守启蒙阵地，坚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它不合潮流，孤军奋战，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击。它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面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自由主义坚持“充分的世界化”；在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盛行之时，它坚持“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当革命派相信启蒙任务已经完成，革命能够改造一切时，它仍然认为没有启蒙就不可能创造现代社会。胡适对学生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8]在救亡压倒启蒙之时，虽然这种思想不合时宜，但确是有远见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缺点在于，它在“五四”以后，只有少数人坚持启蒙工作，多数人或者转变立场，投向政治革命，或者退入学术领域。很多学者如周作人、顾颉刚、沈从文、陈寅恪等人，都只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政治不甚关心，对启蒙也失去了“五四”时期的兴趣，他们只是信奉和要求“学术独立，思想自



由”。这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自由主义。这种学术自由主义的兴起，既与“五四”启蒙主义的退潮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思想有关，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即职业化、科层化，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职业学者和文化人，丧失了政治兴趣。这种学术自由主义固然是有价值的，对于学术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又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它没有战斗力，不仅不能影响中国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抵挡不住政治思潮的冲击。因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学术自由主义也丧失了生存空间。尽管如此，对自由主义的文化启蒙工作应当充分肯定，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为中国的现代性保留了火种。历史将表明，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完成后，重建现代性的任务就摆到日程上来，而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作用将不仅属于过去。

[1] 参阅杨春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断裂与复合》，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2]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载1948年8月6日《周论》第2卷第4期。

[3]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二讲》，引自《民权与国权——孙中山文选》第20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4]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转引自《胡适传论》第6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5] 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337—345页，岳麓书社，1999年。

[6] 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重刊于《东方杂志》17卷16号（1920年8月25日）第133—134页。

[7] 关于胡适退出民权保障同盟事可参阅胡明《胡适传论》第747—7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8]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胡明《胡适传论》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作者单位：厦门大学）